

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辛柏林》中的 性别象征与早期现代英国民族性

遇美娜,王 钢

(吉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摘要:《辛柏林》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传奇戏剧。该剧通过对英国王室贵族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的艺术刻画,以及对男性社群内部、男性与女性之间紧张关系的细腻描写,揭示出性别象征与早期现代英国民族性的内在关联。男主人公波塞摩斯与两位王子的男性气概是早期现代英国民族性的性别象征;王后与公主伊摩琴则分别代表了野蛮、邪恶与温柔、贞洁两种女性气质,这两种女性气质威胁着早期现代英国民族性的塑造。剧中对两位王子身上女性气质的描写,以及对公主伊摩琴在男性社群中联结作用的展现,反映出莎士比亚对其所处时代性别等级极端二元化的反思;结尾处公主伊摩琴与波塞摩斯缔结婚姻则表达了莎士比亚“温柔与力量相结合”的民族性想象。

关键词:莎士比亚;辛柏林;男性气概;女性气质;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22)05-0077-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22.05.011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The Sexual Symbol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in *Cymbeline*

YU Mei-na, WANG G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rtistic depiction of the 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 of the royal and noble characters, and the minute description of the male community,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Shakespeare's legendary play *Cymbeline* shows the internal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xual symbol and early modern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The “masculinity” of the hero Posthumus and the two princes in the play is sexual symbol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Correspondingly, the queen and princess Imogen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wo kinds of “femininity” of evil and barbarism, tenderness and chasteness, which threatens the shaping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emininity in the two princes and the display of the connecting role of Princess Imogen in the male community show Shakespeare's reflection on the extreme duality of gender hierarchy in his time. At the end of the play, the marriage between Imogen and Posthumus expresses Shakespeare's national imagin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tenderness and strength”.

Key Words: William Shakespeare; *Cymbeline*; masculinity; femininity; national identity

作者简介:遇美娜(1998—),女,吉林辽源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欧美文学。

一、引言

莎士比亚传奇剧《辛柏林》讲述了英国国王辛柏林统治时期的一段家国故事,主要通过三条叙事线索交织展开,即公主伊摩琴与绅士波塞摩斯的爱情波折,幼时被窃的两位王子的生活情状与回归,英国与罗马帝国围绕贡款发生的军事冲突。戏剧结尾随着英国在战争中取胜以及邪恶的王后与其子克洛顿的死亡,王室贵族人物得以欢聚一堂,破裂的家国关系最终在爱与宽恕中得到修复。与莎士比亚其他三部传奇剧《泰尔亲王佩力克里斯》《冬天的故事》《暴风雨》相比,《辛柏林》的情节最为错综复杂,英国莎士比亚学者 Wilson Knight 曾对此产生疑问:“为什么莎士比亚费尽心思将一部原本可能是纯粹民族剧的戏剧的情节复杂化?”^{[1]140}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2],民族身份是一种稳定的对于想象共同体的集体回忆;民族性是一种基于民族想象的、区别于他族的文化认同,民族主义则使这种文化认同“与政体保持一致”,从而“努力让文化拥有自己的政治屋顶”^[3]。这些概念往往缠绕在一起,其中,民族身份与民族主义对民族性的想象认同进行同质化创造并将其优先化。民族性建构与性别象征有着紧密关联,“民族性建构通常卷入特定的‘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概念”^[4]。《辛柏林》的情节设计体现出早期现代英国民族性中对男性气概的强调以及对女性气质的排斥与恐惧,是一种对性别象征与民族性关系的戏剧性书写。这显然与詹姆斯一世当政时期性别等级二元对立的极端化有关,而莎士比亚去二元对立化的艺术处理则反映了他对性别象征与民族性关系的反思。

二、男性气概与民族身份及社群建构

民族主义的基本目标包括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民族认同是一种身份认同,而民族身份的建构往往通过“排斥”“区分”“边缘化”等手段来达成^[5]。其中,具有排他性的性别象征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族主义与民族身份建构其实是“男性寻求友谊与社群的一种

选择”^{[6]101}。因此,理想中的男子汉成为男性社群自我定义与民族意识形态形成的基础,亦即男性气概被视为维护国家秩序的手段与民族身份的性别象征。男性气概在希腊文中意为勇气与勇敢,是“与控制恐惧有关的一种德性”^{[7]29},体现出德性的性别关联。在《辛柏林》中,男性气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绅士波塞摩斯与王子吉德律斯、阿维拉古斯,他们共同代表着英国男性民族身份与男性社群的建构,三人的最终回归则象征着英国的民族统一。

男性气概往往与绅士风度联系在一起,是“少数男性以一种最高级的方式具有的品质”^[8]。在《辛柏林》第一幕第一场中,绅士甲与绅士乙的对话初步反映了波塞摩斯完美的绅士风度。剧中的波塞摩斯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好男子”,他在宫廷内备受敬重与赞美,并成为各年龄段男性的典范:“对于少年人,他是一个良好的模范;对于涉世已深之辈,他是一面可资取法的明镜;对于老成之士,他是一个后生可畏的小子。”^{[9]6}在第一幕第四场中,意大利人阿埃基摩与菲拉里奥的评价,再一次突出了波塞摩斯作为英国理想男性代表的特质。波塞摩斯男性气概的突出表现是他在战争中的忠勇。在第五幕中,波塞摩斯身穿英国农民的衣服为祖国而战,在其“卑贱的服装之内”“藏着极大的勇敢”^{[9]95},在营救国王辛柏林、取得与罗马战争的胜利两件大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辛柏林将他视为“天神差下来保卫我王位的英雄”,大臣培拉律斯也惊诧于他能够“表现出这样忠勇的义愤”^{[9]107}。在第五幕第四场中,波塞摩斯父兄的鬼魂显现以及朱庇特的预言则意在强调他是“雄狮的幼儿”“名将的少子”^{[9]122},继承了其家族男性的忠勇气概,“不失列祖英风”^{[9]101},这些评价都意在突出男性气概在民族身份建构与塑造中的重要性。

剧中男性气概的另一重要代表是王子吉德律斯与阿维拉古斯,作为王室的真正继承人,他们集中体现了具有雄心的男性气概,是王室纯正血统与民族延续的根本保证。剧中交代,两位王子小时候被大臣培拉律斯偷走,从此在威

尔士的山野度过了二十年。剧中的威尔士山野是一个“不受女性污染的男性气概的安全场所”^[10],在这里,两位王子的男性气概得到充分发展。在培拉律斯的教养下,他们的雄心“可以冲破王宫的屋顶”^{[9]56}。培拉律斯多次强调两位王子天生具有卓越的男性气概与高贵品格,这也说明了男性气概与国家统治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剧中大王子吉德律斯与王后的儿子克洛顿之间的决斗是一个重要情节,吉德律斯将其视作对自己男性气概的考验。男性气概是对个人价值的宣告,如果保持沉默或无所作为,那么就意味着男性气概的被压抑与被埋没,也就意味着对荣誉的放弃,“没有人会注意男性气概中沉默的类型,他们闭上嘴巴就只能依靠别人给他们应得的荣誉”^{[7]124}。因此,面对克洛顿的叫嚣,吉德律斯反问道:“我的臂膀不及你的粗吗?我的胆量不及你的壮吗?”^{[9]78}这场决斗同时也“象征性地成为母亲的儿子和父亲的儿子、假继承人和真继承人之间的斗争”^{[9]113}。吉德律斯最终战胜了克洛顿,“不仅证明了自己的男子气概,还开始了重新获得完整身份的过程,取代克洛顿成为父亲的继承人,象征性地维护了父亲的权力传承”^{[9]113}。

从身份象征来看,两位王子吉德律斯与阿维拉古斯的成长环境——威尔士山野是他们男性气概的生成与发展场所,因此,具有雄心的吉德律斯与阿维拉古斯实际上是威尔士的身份象征;波塞摩斯的经历颇为曲折,他的男性气概在其人生起伏中被过激的情绪所遮盖、干扰,时而呈现出偏执的暴怒,时而陷入萎靡与低沉,直到在战场上为祖国而战,他的忠勇才重新迸发。波塞摩斯这种不稳定的男性气概在一定程度上指涉着苏格兰,他与辛柏林的矛盾则象征着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紧张关系。国王辛柏林是英格兰本土的代表,王后的死亡恢复了他的男性气概,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伊丽莎白女王的死亡与詹姆斯一世的即位。莎士比亚的《辛柏林》揭示了“英国的完整性(以国王为象征)是由王室成员和波塞摩斯所代表的男性气概保护的”^{[1]139};象征威尔士的两位王子与指涉苏格兰的波塞摩斯的最终回归,则反映了詹姆斯一世

时期英国民族一体化的进程。

三、女性气质与民族身份及社群建构

女性气质是一个“社会性别的范畴”^[11],本质上由父权制社会“基于对女性正常和非正常的人为划分”建构而成^[12],主要特征包括顺从、敏感、柔弱、淫荡、邪恶、破坏等。社会性别“应被理解为一种‘话语方式’”^[13],在民族性、民族主义与性别的关系中,从男性经验酝酿出的民族主义意识极其注重区分女性气质与男性气概的差异,并将女性气质视作民族主义发展的阻碍。在早期现代英国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中,男女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各自的角色也更加固定,女性被改造成静止不变的符号,逐渐成为野蛮、邪恶或温柔、贞洁的象征,并被排斥、消除、驯服乃至边缘化。《辛柏林》中野蛮、邪恶气质与温柔、贞洁气质的代表分别是王后与公主伊摩琴。

剧中的王后是野蛮、邪恶气质的代表,对早期现代英国以男性气概为象征的民族身份及社群建构产生巨大威胁,她的死亡标志着国王辛柏林男性气概的恢复及男性社群的生成、互动与稳固。

在男权社会中,那些不符合理想女性气质的女性“被视为对社会和国家的威胁,威胁到男性本打算维护的既定秩序”^{[6]101}。因此,人们对具有革命性或强烈叛逆性的女性深恶痛绝。剧中的王后便是这样一个女性人物,她被形容为一个“奸诈的魔鬼”、一个“时时刻刻都在制造阴谋的母亲”^{[9]33}。她意图毒死公主伊摩琴和国王辛柏林,表面看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克洛顿继承王位,而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她是“麦克白夫人与高纳里尔的结合体”,是“残忍的化身”^[14]。剧中面对延续罗马贡款传统的要求,王后的态度极为强硬,提醒辛柏林不要忘了“先王们缔造的辛勤”和“岛上天然的优势”^{[9]48-49},最终使英国陷入战争。王后的形象及面对罗马时的态度、表现与霍林斯赫德笔下的女王沃迪亚极为相似。历史上的沃迪亚反对罗马征服者,她在演讲中一再强调大不列颠岛的自然优势以及历代英国国王的光荣历史,但她最终未能将英国从罗马帝国的枷锁中

解放出来,并在一场具有决定性的战斗后自杀。沃迪西亚在英国人眼中是一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她在英国历史上甚至被认为是“英国人残忍的可怕例子”^[15]。从性别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来看,王后的死亡具有必然性和过渡性。因为只有王后的死亡才能使国王辛柏林从女性气质的压制下解放出来,重新恢复男性气概;也只有王后的死亡才能使王子们顺利回归,王室男性纽带才能延续。剧中交代,辛柏林少年时代是在凯撒麾下度过的,是凯撒启蒙了他的荣誉感。因此,他将英国与罗马之间的战争及贡款的中止全部归咎于“奸恶的王后的主意”^{[9]123},意在强调是她“破坏了辛柏林与罗马之间的血缘、承诺和荣誉的男性关系网络”^[15]。

剧中的公主伊摩琴是温柔、贞洁气质的代表,她是被极度理想化的女性形象。伊摩琴的女性气质使她从未被考虑进国家的权力范畴,并始终在男性社群中处于从属地位,只有在女扮男装时她才获得了身份认可。

民族主义和认同它的男性社会“以贞洁谦逊的女性为榜样来展示他们的高尚目标”^{[6]101},并使女性服从这一道德规范以赢得富有男性气概的男性的认可,从而达到规训女性的目的。伊摩琴公主就是这样一位理想女性,她被形容为“一片温柔的空气”^{[9]122}。在男性那里,女性气质被简单粗暴地等同于贞洁,从而“使女性等同于她的身体,等同于她们身体上那些纯粹的肉体存在”,女性的民族身份被抽空,成为“实现男性理想的工具和欲望的对象”^[12]。而女扮男装的伊摩琴,不仅意味着性别的转变,更意味着性别身份的转变,因此得以成功加入男性社群,获得男性社会的认可。例如与两位王子和谐相处,被罗马主将卡厄斯·路歇斯所赏识而加入军队等。正如卡厄斯·路歇斯所夸赞的那样,此时的伊摩琴展现出了男性气概,“指出了我们男子汉的责任”^{[9]89}。剧末伊摩琴与卡厄斯·路歇斯的拥抱则反映了她作为公主所象征的民族身份的复杂性:“无论是她想象中的女性身体,还是她男性的伪装,都不能为英国提供稳定的男性身份。这种伪装和备受质疑的忠诚形象

所代表的性别、地位和民族身份的不稳定性妨碍了任何稳定身份的构建,无论是个人身份还是国家身份。”^[15]

剧中的王后并没有名字,反映出在早期现代英国男性社群的暴力话语罗网下,不符合女性规范的女性只会成为邪恶、变态的能指符号,以一种无名污秽的形态成为男性民族主义运动的牺牲品。而伊摩琴圣母玛利亚与狄安娜般的温柔、贞洁的气质实际上是男性社群对顺从女性的一种“捧杀”,民族主义越高涨,玛利亚式与狄安娜式的女性则越被推崇。从本质上来看,无论是野蛮女性的被排斥还是贞洁女性的被推崇,背后都隐藏着男性民族主义对女性力量的恐惧与焦虑,他们试图通过建立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将女性固定于各自位置,借以强化性别之间及“正常”与“非正常”之间的区别,从而达到维护男性秩序的目的。

四、超越性别等级二元化的早期现代反思

社会性别是一个由生物事实向社会属性转化的语境化过程,当性别与等级相关联时,它便不再是“一个自主系统”,而是“由两性彼此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政治、文化和经济所塑造”^[16]。在早期英国现代化过程中,性别等级二元性趋向稳定,在民族性建构中起到了重要的性别象征与隐喻作用。“性别的等级二元性是早期现代社会建构的基础”^[15],与早期现代的性别政治关系相适应。通过对性别的等级二元化处理,早期现代英国一方面保证了男性政治的延续性,构建了更为稳固的男性社群,另一方面将女性与原始野蛮进行捆绑,将两者一并从中心话语场域与政治意识形态中驱除,进而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

从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早期现代英国民族主义的极端性别对立与当时的女性掌权及詹姆斯一世的厌女倾向有直接关联。玛丽一世与伊丽莎白一世的相继登基为王,唤起了英国男性对历史上野蛮女王的记忆,引起了全社会强烈的不满。当时的苏格兰新教神学家

约翰·诺克斯对此有针对性地发表了著名檄文,将女王视作怪物,给玛丽一世与伊丽莎白一世以无情鞭笞。伊丽莎白一世死后,男性社群所积攒的焦虑与不满终于随着极端男权代表詹姆斯一世的上台而彻底爆发。据考证,“具有强烈同性恋倾向”的詹姆斯一世在“青年时期就对女性怀有敌意”^[17],他的这种厌女倾向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的性别化,并使性别等级二元对立走向极端。

作为时代的感知者与记录者,莎士比亚一直通过戏剧对早期现代英国的民族性与社会性别问题进行艺术化反映与反思,并“不自觉地、无意识地出现了怀疑甚至反对的观念”^[18],充分体现出早期现代英国过渡性、多面性、矛盾性的社会特点。莎士比亚处于一个过渡性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部分是现代的,部分不是”^[19]。在历史剧中,莎士比亚富有创造性地再现了英国本土、英国与欧洲之间发生的历史事件,着重刻画了正面男性历史人物的男性气概,是一种对都铎王朝神话与民族国家想象的艺术化书写。在罗马悲剧中,莎士比亚借罗马历史背景或历史事件表达他的英雄与开明君主相结合的民族观,强调君主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领导地位与突出作用。到了晚期传奇剧创作时期,莎士比亚对英国民族性与性别象征关系的思考趋向成熟,“隐蔽自我”的人生与艺术创作态度、暮年注重沉思的心境,使他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同时更能冷静地超脱于时代。其中,《辛柏林》聚焦于“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是莎士比亚对民族性与性别象征关系的集中思考与理性反思,是具有凝聚性与标志性的艺术与思想总结。

《辛柏林》对早期现代英国民族性与性别象征关系的理性反思具体表现为:在展现两位王子的男性气概的同时,又注意刻画他们的女性气质;突出了公主伊摩琴在男性社群中的连接协调作用,表达了莎士比亚对詹姆斯一世时期极端男性化民族主义现象的担忧以及去性别等级二元对立的思想。

在第四幕第二场中,大臣培拉律斯形容两位王子“像微风一般温柔,在紫罗兰花下轻轻拂

过,不敢惊动那芬芳的花瓣”^{[9]81},而当受到激怒时便会像暴风一样凶猛。培拉律斯的评价说明两位王子的形象并不是刻板地只有一种男性气概,而是兼具女性的温柔与男性的凶猛。其中,小王子的女性气质最为明显。当女扮男装的伊摩琴陷入假死状态时,两位王子为其举行了富有诗意与美感的葬礼,小王子阿维拉古斯则悼念道:“斐苔尔,我要用最美丽的鲜花装饰你的凄凉的坟墓;你不会缺少像你面庞一样惨白的樱草花,也不会缺少像你血管一样蔚蓝的风信子,不,你也不会缺少野蔷薇的花瓣。”^{[9]83}这与《泰尔亲王佩力克里斯》中玛丽娜以花祭奠泰莎的场景极为相似。在莎士比亚戏剧中,各种花名大多出自于女性口中,花是女性气质的一种象征。阿维拉古斯在不知伊摩琴是女性的情况下的表现,其实是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男性气概的言行标准的。紧接着,大王子吉德律斯提醒阿维拉古斯道:“好了好了,不要一味讲这种女孩子气的话。”^{[9]83}这也充分说明了阿维拉古斯的女性气质的显露。如果说剧中王后命人在花园采集花朵代表着她的邪恶被女性化的、温和的表象所遮掩,起到的是反衬的艺术效果,那么对王子女性气质的刻画则在一定程度上寄寓了莎士比亚对完美王室继承人的理想,即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结合。

在剧末的欢聚场景中,伊摩琴公主的眼神像温情的闪电,一会儿向着丈夫波塞摩斯,一会儿向着哥哥们,一会儿向着父亲辛柏林,“到处投掷她的快乐;每一个人都彼此交换着惊喜”^{[9]121}。在这个主要由男性构成的场景中,伊摩琴作为联结的中心而不可或缺,说明女性在男性社群建构与维护中起着重要作用。所谓“温柔女性气质”实质上是一种母性般的包容、团结与支撑力量,只有在女性气质的场域中,民族主义社群才能健康持续地生成互动。剧中朱庇特的预言实际上也揭示了这一点,即只有当雄狮的幼崽波塞摩斯“为一片温柔之空气所笼罩之时”^{[9]122},英国民族才会走向昌盛。因此,波塞摩斯与伊摩琴的成功婚姻象征着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结合,表达了莎士比亚“温柔与力

量相结合”的民族思想^{[1]164}。

五、结语

在民族性想象、认同、建构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历史文化层面,实际上都充满了性别隐喻。性别与民族性的缠绕一方面与民族主义运动及意识形态有关,另一方面则与长期的父权与男权制社会形态有关。父权与男权社会通过“私人—公共领域”“自然—文明”两种二分法,将女性从公共政治领域与政治文明中排除,从而使男性拥有独立的政治代表权。当国家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争夺并维护霸权的男性集团便通过具象化的性别象征推动民族主义发展。早期现代英国便处于这样的特定历史时期,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性别特征以“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的概念显化,从而为早期现代英国民族性奠定了坚实的想象性与合法性基础。

民族性建构的性别化区分通常也由文学来完成。受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17 世纪的英国戏剧试图通过艺术处理排斥女性气质,并在男性社群中寻求庇护与互动,因此戏剧通常以强大叛逆女性的死亡与男性团结场景收尾。《辛柏林》显然也遵从了这一戏剧表现模式,但莎士比亚的反思意识与进步女性观使其并未局限于时代意识形态潮流。在剧中,莎士比亚隐喻性地表达了他的民族性理想,充分体现出他在早期英国现代进程中的独特角色与突出作用。

参考文献:

- [1] KNIGHT W. The crown of life: essays in Interpretation of Shakespeare final play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 吴叡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6.
- [3] 厄内斯特·盖尔纳. 民族与民族主义[M]. 韩红,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57-58.
- [4] DAVIS Y. Gender and nation[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7: 1.
- [5] GIDDENS A.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 [6] MOSSE L. Nationalism and sexuality: middle-class morality and sexual norms in modern europe[M].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20.
- [7] 哈维·曼斯菲尔德. 男性气概[M]. 刘玮,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 [8] 隋红升. 跨学科视野下的男性气质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90.
- [9]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7 卷[M]. 朱生豪, 方平, 杨周翰,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10] RYAN K. Shakespeare: the last play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112.
- [11] 魏天真, 梅兰.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149.
- [12] 韩海琴. 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男女间性: 马丁·艾米斯小说性属主题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
- [13] 陈顺馨, 戴锦华. 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14.
- [14] 张泗洋, 徐斌, 张晓阳. 莎士比亚引论: 下[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9: 130.
- [15] MIKALACHKI J. The masculine romance of roman britain: cymbeline and early modern English nationalism[J]. Shakespeare Quarterly, 1995(3): 301-322.
- [16] AMUSSEN D. An ordered society: gender and clas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4.
- [17] 郭方云. 文学地图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238.
- [18] 胡鹏. 莎士比亚戏剧早期现代性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5.
- [19] GRADY H. Shakespeare and modernity[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7.

(责任编辑: 白丽娟)